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0-8

2010年2月9日

“高崗問題”的若干考證及其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高崗事件”曾被染上“黨內路線鬥爭”的色彩,如果我們將其放入更大的歷史背景即 1945 年美蘇英簽訂的以犧牲中國主權利益的“雅爾塔秘密協定”¹ 陰影下的中蘇關係中考察,就會發現,除了黨

¹ 1945 年 2 月 10 日, 開始雅爾塔第七次全體會議。在此之前, 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遞交一份“斯大林元帥關於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政治條件草案”, 經斯大林、羅斯福兩次修改後, 即成為 2 月 11 日邀請丘吉爾共同簽署的作為雅爾塔正式文件的〈蘇美英三國關於遠東問題的協定〉, 文件不長, 但對遠東政治影響卻至為深遠。內容如下: 蘇美英三大國領袖同意, 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 其條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以維持。2、由日本 1904 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權益須予以恢復, 即: 甲、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 乙、大連商港須國際化, 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 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以恢復; 丙、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 經諒解, 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3、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經諒解, 有關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鐵路的協定尚須徵得蔣介石委員長的同意。根據斯大林大元帥的提議, 美總統

內矛盾的因素外，它更是毛澤東與斯大林利用雅爾塔協定控制中國新疆和東北企圖鬥爭的繼續。

一、科瓦廖夫提供的新材料

新中國成立前後，斯大林曾派遣私人特使科瓦廖夫與毛澤東聯繫。俄羅斯《遠東問題》雜誌英文版 1992 年第 1~2 期刊登了俄羅斯歷史學家、漢學家塞格·岡察洛夫對科瓦廖夫的專訪。在採訪中，科瓦廖夫根據自己的親歷及當年摘錄的電報筆記對 1948~1950 年間中蘇關係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些新材料，這些材料曾為國內多家媒體轉載，其中關於“高崗的背叛”部分抄錄如下：

1949 年 7 月 27 日² 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高崗表現得十分興奮，高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蘇聯當時有 16 個加盟共和國）。高崗認為，這樣做可以避免東北遭到美國侵襲，並且可以成為南進擊敗蔣介石鬥爭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崗發言結束後，與會者報以掌聲，但是劉少奇顯然對此非常生氣。

這時，斯大林站了起來，對坐在第一排的高崗說：“張作霖同志！”大會隨即一陣騷動，因為張作霖是一個土匪，他曾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成為東北獨裁者，後來又被日本人殺了。

將採取步驟以取得該項同意。三強領袖同意，蘇聯之此項要求須在擊敗日本後毫無問題地予以實現。蘇聯本身表示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蘇中友好同盟協定，俾以其武力協助中國達成自日本枷鎖下解決中國之目的（〈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1945 年 2 月 11 日），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第 868 頁）。

² 應為 1949 年 6 月 27 日，斯大林同秘密訪蘇的由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舉行會談。7 月 27 日，斯大林宴請劉少奇和江青。科瓦廖夫可能將二者在時間上混淆了（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729、731 頁）。

會後，我與高、劉坐一輛汽車回他們的下榻地。劉在車上就指責高背叛，高為自己辯護。回到住地，高用俄文困難地對我說，他想在一個秘密場合向我報告中共高層領導內部的一些情況，他還提到，他要講一個很重要的關於某些中國領導人對待中蘇關係虛偽和反蘇行爲的問題。

我立即走到二樓，通過秘密電話向斯大林報告了這一切。斯承認對高的批評是過於嚴重了，但他說他必須這樣做，否則中國領導可能會誤解形勢。他禁止我去聽高崗的情報，說我還要回到中國去工作，不要捲入中國領導層的爭吵中去。據我所知，斯大林派了另外一個同志去聽取高崗的陳述，並將談話內容報告了斯大林。

三天後，斯大林在孔策沃鄉村別墅爲高崗舉行了一個送別招待會，在招待會上，斯大林竭力調解高和劉的矛盾，甚至建議他們倆爲友誼乾杯。劉少奇爲了不使主人掃興，顯然很勉強地乾了這杯酒。

第二天早上，高崗搭機回國；他的情緒很低，中國代表團沒有一個來送行。那天晚些時候，在與劉少奇的會談中，斯大林說：“我那天對高批評得太重了，你也是，我們都沒有什麼根據，請把我的意見轉告給毛同志。”

劉大概很好地完成了這一委託，因爲不久高崗即被任命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擔任很重要的職位。毛在多次與我的談話中，經常強調，他一直支持高崗。但這並不意味著高崗頭上的陰影已消失。

1949年9月，一個香港百萬富翁代表團訪問了毛澤東，要求允許他們到東北去看看。毛同意了。這個團回到北京後，又見到毛並談了他們對東北的印象。

他們說，東北的秩序雖然很好，但感覺不到是中國在那裡進行統治，倒好像是有點來自北方的鄰國。最使他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幾乎看不到毛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在東北卻到處都是。毛聽到這個情況後很生氣，當天就把高崗召到北京來參加政治局會議，議程只有一條，即討論“照片問題”。

香港資本家看到的情況是真實的，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1948年底一個蘇聯新聞電影製片工作者小組來中國訪問，他們感到在共產黨解放瀋陽後，卻看不到斯大林的照片，感到很失望。在這種意見的影響下，高崗命令瀋陽和東北其他城市趕製斯大林畫像，並把畫像掛起來，當然也有可能他以此來表示他對毛的不滿，但現在很難說清。

政治局的會議一直開到晚上，大約清晨四時左右，高崗氣勢洶洶地跑來告訴我開會的情況，劉少奇第一個發言，嚴厲批評高。他將高在莫斯科建議把東北改建為蘇聯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的事與東北不掛毛澤東照片的問題聯繫起來；周恩來接著發言，他指責高背叛，企圖把東北讓給蘇聯，他建議把高崗開除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員會。毛澤東沒有發言，只是在投票時，支持譴責“高崗路線”的決議，並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從全中國摘除。

高走後，我決定毫不耽誤立即向莫斯科報告。

第二天，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向我解釋了關於照片的事。根據他們的說法是這些照片質量太差了，必須拿掉。最後，在我並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與毛澤東就照片的事談了一次話，雙方同意在蘇聯軍事部門、中蘇合營工廠企業以及共產黨、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裡，斯大林的畫像不拿下來。

第二天，斯大林拍來一個電報，支持毛澤東、劉少奇譴責高崗。我把電報拿給毛澤東看，但只給他唸了前面的一部分，譴責高崗的那一段沒有唸。有人發現我漏唸了一段，並將此事報告了莫斯科，過了一天我收到一份很嚴厲的批評我的電報，我只好再去見毛澤東，並把電報的內容全部唸給他聽，毛澤東對我作的補充很高興。

1949年12月初，毛澤東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瀋陽停車，並邀請我一起去參觀市容。瀋陽所有的大建築物上都掛著斯大林的半身像，毛的照片幾乎看不到，毛澤東對此顯然十分不高興。回到火車站，市委書記向毛澤東報告說，東北工人和高崗、林彪準備了一車皮禮品送給斯大林祝賀他 70 歲生日。這節車現在就掛在毛澤東車廂的後

面，毛澤東聽後指示說：“把這節車卸下來，把禮品也卸下來，一半送到高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裡，對他們倆說，我已經準備了來自全國的禮品送給斯大林，東北至今還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高崗的最後的致命打擊，發生在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我已經開始了準備送給斯大林的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報告中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一些尖銳的批評。1950年2月，就在毛澤東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之前，我聽說斯大林把我的這份報告，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關於中共中央的秘密電報送給了毛澤東。更嚴重的是，斯大林還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給了毛澤東。

很久以後，我知道了斯大林向毛澤東遞交這些文件是在米高揚的合作下完成的。1967年7月25日，我們有過一次談話；米說，他怎麼也弄不明白，斯大林這樣做的動機究竟是什麼。至於我則一開始就感覺到，高崗這下子徹底完蛋了。³

二、兩點考證

科瓦廖夫上面回憶的關鍵是披露高崗在“7月27日”會議上關於“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以及高崗向斯大林告密兩個問題。筆者就科瓦廖夫指認的這兩部分內容的真實性做些必要的資料考證及分析。

關於第一個的問題。

科瓦廖夫這個指認的最大問題是時間和空間的不一致。科瓦廖夫說“高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的時間是“1949年7月27日”，地點是“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如果科瓦廖夫確認事件的日期為“27日”，那只能是6月27日，而

³ 韶山毛澤東圖書館：〈毛澤東研究數據庫〉（<http://www.mzdlib.com/libszzy/MaoZeDongXingJiuShuJuKu/3674.html>）；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280~281頁。

不“7月27日”，因為6月27日斯大林在他的辦公室同秘密訪蘇的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舉行首次會談，並沒有召開有劉少奇參加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在7月27日這天斯大林宴請劉少奇和江青，高崗在場。⁴ 科瓦廖夫可能將二者在時間上混淆了。因為科瓦廖夫說“三天后，斯大林在孔策沃鄉村別墅為高崗舉行了一個送別招待會”，如以7月27日算，三天后即7月30日高崗回國。這裡，科瓦廖夫可能將宴請劉少奇和江青的招待會誤認為——或許他就是這麼認為——是送別高崗的招待會了。

從實際情況看，6月27日劉少奇剛到莫斯科不久，在這個時刻召開蘇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並讓劉少奇一行“列席”參加似不可能，高崗剛到莫斯科並在會上說那麼唐突的話也不可能。據《劉少奇年譜》，劉少奇一行在蘇訪問期間，只有7月11日這天“列席”⁵ 參加了蘇共政治局會議。這時高崗到蘇已有十多天，自認為他已“獲得到對方特別的好感”。鑒於高崗不拘小節的個性，這時他有可能說話輕率。⁶ 但這天的會則與科瓦廖夫說的“7月27日”時間不合。因此，科瓦廖夫所說的高崗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的真實性，就無法確認。因為這天蘇共沒有召開有劉少奇“列席”參加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任中方譯員的師哲對科瓦廖夫的說法更是持否定的態度，他在接受李海文採訪時說：

科瓦廖夫根本就沒有參加過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劉少奇去蘇聯，科瓦廖夫同行，他的工作是我們到大連，由他出面向蘇軍交涉，

⁴ 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第731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19頁。

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218頁。

⁶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32頁。

派飛機送劉少奇一行經朝鮮上空、遠東到莫斯科。在路上用了七、八天時間。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時將科瓦廖夫帶到克里姆林宮。但是他沒有到談判的房間，在外面等著。斯大林知道他也來了，派人把他叫進來，問他一路上的情況。他見了斯大林像個小學生一樣站得筆直，十分緊張、拘謹。回答完了問題，斯大林示意讓他出去，他就趕快退出會場。所以他並不知道談判的經過。⁷

但是，師哲上述所說的“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時間不僅與目前解禁後的蘇聯檔案，而且與中方的文獻出入較大。比如師哲在回憶錄中將他隨劉少奇一行從清華園出發赴莫斯科的時間定在7月2日，⁸而《劉少奇年譜》將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離北平赴蘇聯訪問”的時間確定為6月21日，到達莫斯科的時間確定在“6月26日”。⁹這裡師哲說的代表團從北京出發時間竟比《劉少奇年譜》中到莫斯科的時間還要晚，顯然師哲記憶有誤。

另外，師哲關於“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在時間和會議列席人員的記憶也有錯誤。蘇方文件關於這次會議的時間均記錄為1949年6月27日，《劉少奇年譜》記錄的時間是6月28日，莫斯科與北京時差五個小時，二者的差別可能為時差所致。但這不影響我們的考證。據A. M. 列多夫斯基提供的標有“絕密”字樣的〈斯大林與中共代表團的會談記要（1949年6月27日）〉有如下明確“附註”：

斯大林與代表團的會談記要是由伊·弗·科瓦廖夫整理的。經斯大林審閱並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進行了補充和修改。文件中還有這樣的附註：符·莫洛托夫親啓。問題序號是斯大林加的，正文，頁邊的著重線是斯大林畫的。

⁷ 李海文：〈毛澤東訪蘇的真實記錄〉，轉引自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281頁。

⁸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396頁。

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217頁。

文件註明會談時間為“6月27日23時至24時進行”，參加會議的人員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同志；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卡爾斯基（即師哲，翻譯）和伊·科瓦廖夫。¹⁰ 這份文件至少說明，科瓦廖夫參加了會議而且作了會談記要。有意思的是，蘇聯歷史檔案提供的《斯大林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中關於1949年6月27日這天斯大林接見劉少奇一行人員進入會場的記錄與師哲的記憶正好相反。這天的登記簿記錄是這樣的：

- 1、莫洛托夫同志，22點45分進入，0點15分
- 2、米高揚同志，22點45分進入，0點15分
- 3、馬林科夫同志，22點45分進入，0點15分
- 4、科瓦廖夫同志，23點00分進入，24點00分
- 5、劉少奇先生，23點00分進入，24點00分
- 6、高崗先生，23點00分進入，24點00分
- 7、王稼祥先生，23點00分進入，24點00分¹¹

這是劉少奇一行到達莫斯科後首次受到斯大林接見，因而不可能有記錄錯誤。檔案記錄顯示：科瓦廖夫於當天晚23點進入，24點離開斯大林辦公室，進出的時間與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完全一致。這說明科瓦廖夫不僅參加了會議，而且是隨中方人員同進出，因此可以斷定他也在現場。師哲記憶與此不合。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辦公室記錄的這次會議進出人員中卻沒有師哲。這說明師哲所說的“科瓦廖夫根本就沒有參加過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的記憶是不準確的。

不僅如此，師哲還將“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的時間也記錯

¹⁰〈斯大林與中共代表團的會談記要（1949年6月27日）〉，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97頁。

¹¹〈斯大林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二）〉，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0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724頁。

了。他在回憶錄中說：

我們抵達莫斯科……代表團稍事休息後，被邀請到斯大林的夏令別墅（在孔策沃附近）。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中央政治局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米高揚等都站在門前迎接客人。賓主相互握手之後，斯大林設宴招待劉少奇和代表團其他同志，雙方邊吃邊談，無拘無束，十分自然，這次宴會持續將近四個小時。¹²

師哲回憶的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在《劉少奇年譜》為7月10日，時間、地點、蘇方人員與師哲記憶完全一致，¹³ 只是時間上不是代表團剛到莫斯科“稍事休息之後”，而是6月26日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後的第14天。據《劉少奇年譜》，劉少奇一行從6月26日至8月14日在蘇聯訪問期間，只有7月11日這天“列席”¹⁴ 參加了蘇共政治會議。師哲在回憶錄中準確地記錄了這次會議，但他明確表示：“科瓦廖夫是陪同代表團到蘇聯的，因而也出席了會議。”¹⁵ 這說明，師哲所說的“科瓦廖夫根本就沒有參加過”的“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並不是這次會談。但這是劉少奇一行“列席”參加的惟一的一次蘇共政治局會議，會議的形式與科瓦廖夫的回憶一致，但時間不一致；會議內容與師哲回憶一致，但參加人員卻不一致。最有可能的是師哲和科瓦廖夫都將這7月11日的會議與6月27日中蘇第一次會談混淆了。時間和空間的記憶錯位，使得科瓦廖夫關於高崗“1949年7月27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的說辭以及師哲的否定意見，不

¹²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397~398頁。

¹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218頁。

¹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第218頁。

¹⁵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404頁。

管人們會有怎麼不同的傾向性判斷，在更多的檔案披露之前，也只能視為各家說辭，尚難採信；但從高崗回國後表現出的有失原則的對蘇傾斜態度看，若做出高崗希望得到斯大林的特別賞識的判斷，則大體可以成立。據馬畏安著《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披露：

對此次蘇聯之行，高崗非常滿意，仿佛一股熱流，在胸中湧動。他作為中共正式代表團成員，卻比其他任何一個成員更能體諒蘇聯政府的困難，說話也更公正和公道，加上他借助科瓦廖夫而表現出來的對蘇聯同志的特別的熱情，因而也獲得了對方特別的好感。這個代表團的訪蘇，本來是一次秘密行動，高崗在蘇聯報紙上見報，公開露面，不過是從工作需要出發，為了工作的方便。在高崗看來，這似乎有什麼深意。

這一切，都使高崗精神亢奮，躊躇滿志。回國後，他向身邊的人不止一次說：“這次訪蘇，收穫很大。這收穫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肯定地說：斯大林是不喜歡劉少奇的，對周恩來也不怎麼重視。相反，無論斯大林也好，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也好，看見我的時候，眼神都有些不同。為什麼呢？大概他們不是賞識我臉上的麻子吧？”¹⁶

下面我們再來談談科瓦廖夫回憶文章中提到的第二個即高崗向斯大林“告密”問題。這個問題與上面說的第一個問題在時間順序上前後相隨，前者出現於1949年6月底至8月中旬劉少奇訪蘇期間，後者出現於當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期間。

高崗向斯大林告密的真實性，國內文獻說法不一。¹⁷ 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汪東興日記》、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¹⁸ 何明、羅鋒《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¹⁹ 邢

¹⁶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32頁。

¹⁷ 姬文波：〈關於“高饒事件”幾個重要問題的研究與爭論〉，《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8年第1期。

¹⁸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115~117頁。

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²⁰ 以及師哲回憶錄等書中均有與科瓦廖夫上述回憶相吻合的文字。其中，師哲、汪東興和薄一波的回憶最有份量。

斯大林將科瓦廖夫的告密中共的“材料”轉交毛澤東時，師哲是在場翻譯，他的回憶最具權威，他說：

不出所料，科瓦廖夫回去之後寫了一封污蔑中國的長信，斯大林收到信後，即刻轉交給我們，並說：“這是科瓦廖夫自己寫的，不是我們授意的。須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個技術員，卻往政治裡鑽，這是很不適當的。”²¹

1949 年 12 月 28 日，汪東興在日記中對此寫得更為具體清楚並附帶出毛澤東的判斷：

深夜，毛主席對我說：“等我把國內的事情處理完了，我有話對你講”。毛主席辦完公，把我叫來，對我說：“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給我一份有關中國問題的信，這封信中涉及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問題，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讓別人寫告洋狀。”毛主席問我：“你知道什麼是告洋狀嗎？”我說：“就是向洋人告狀嘛。”主席點頭同意。

事情是這樣的，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斯大林將蘇聯派往東北鐵道系統專家科瓦廖夫給他的一封信交給毛澤東看了。斯大林解釋說，“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寫的，不是我們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個技術員，卻往政治裡鑽，這是很不恰當的。”²²

¹⁹ 何明、羅鋒：〈科瓦廖夫的秘密報告〉，《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45~59 頁。

²⁰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8 年，第 551、558~559 頁。

²¹ 李文海整理：《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 397~398 頁。

²² 汪東興著：《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第 168 頁。

事實上，毛澤東是有道理的，科瓦廖夫一個外國人，如果沒有中國黨內相當地位的人配合，他是寫不出那樣的材料的。而與科氏配合的人，在當時只能是高崗。師哲與汪東興是與毛澤東經歷這件事的當事人，他們對此事細節的敘述因工作紀律要求一定作了盡可能的壓縮。在 1992 年接受專訪中，科瓦廖夫還補充說：“更嚴重的是，斯大林還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給了毛澤東。”這可能是後來的事，也可能是科瓦廖夫個人的猜測。根據毛澤東對汪東興說的話判斷，當時斯大林給毛澤東的只是科瓦廖夫寫的“一份有關中國問題的信”而沒有高崗寫的材料，因為毛澤東說“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讓別人寫告洋狀”。

薄一波不是當事人，他的回憶反映了毛澤東帶回的科瓦廖夫密信在中國黨內的反應。薄老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提供了較多的內容：

高崗對劉少奇同志的懷恨和反對由來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講話後不久，曾批評東北局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高崗不僅不去思考這個批評有沒有道理，反而不擇手段地進行報復和攻擊，甚至公然在當時擔任過東北鐵路系統的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後來還一度擔任過財經方面的總顧問）面前造謠中傷說，中國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科瓦廖夫隨即寫信告訴了斯大林。高崗訪蘇回國以後，又向人散佈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而最賞識他高崗。²³

薄老 1991 年的回憶與赫魯曉夫 1971 年回憶內容是吻合的。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是個簡單——有時還真有些率真——的人，他在回憶錄中說：

²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311 頁。

記得日本人在華北失敗後，斯大林曾派他（即科瓦廖夫 — 引者註）去指導滿洲鐵路的重建工作，兼任我們駐滿洲的全權代表。我們是信任他的，斯大林把他視為親信。我們的這位代表開始向我們報告，說中國領導班子中有許多人對蘇聯和我們黨不滿。據他說，口頭上積極反對我們的有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提到的人裡面沒有毛，但毛對在中國領導班子中散佈反蘇情緒的那些同事也未採取任何措施。斯大林把大使送回來的某些文件拿給我們傳閱，因此我瞭解其中的內容。

關於中國黨內這種情緒的情報，有許多顯然是高崗捅給我們的。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裡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由於斯大林出賣了高崗，我們失去了一位對我們真正友好並能就中國領導班子內對蘇聯的真實態度提供寶貴情報的人。²⁴

赫魯曉夫的話有相當的可信度，因為他在回憶錄中也同樣率真地披露了為蘇聯提供情報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貝利紹娃，他說：“有一個訪問中國後取道莫斯科回國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我們透露了阿巴尼亞人和中國人的這種背叛行徑。代表團成員之一，一位誠實的婦女（即貝利紹娃 — 譯者註）來找我們，告訴了我們內幕情況。我想，在那以後不久她就被絞死了，可憐的女人！”²⁵

三、斯大林為什麼要“出賣”高崗？

在周邊友好國家培養代理人是斯大林蘇聯戰後外交的重要內容。1944年1月1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長篇報告，就未來和平和戰後世界政

²⁴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378、379、380頁。

²⁵ 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776頁。

治安排提出建議。事後看來，這篇報告對斯大林對歐洲和遠東的戰後構想有較大的影響。關於中國，報告開篇“總的設想”部分，開宗明義：

爲了勾勒出關於未來和平最佳條件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設想，必須首先明確地表述出你所追求的具體目的，因爲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所採取的手段。在我看來，我們在構建未來和平和戰後秩序時的具體目的，應當是：造成一種局勢，使得在長時期內，至少在歐洲和亞洲，蘇聯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和平得以維持。如何理解“長時期”這種提法？我把這個詞理解爲，足夠用來完成以下事項的時間：²⁶

1) 使蘇聯得以強大到無論在歐洲或在亞洲發生的任何侵略都對它不構成危險。不僅如此，還要讓歐洲、或亞洲的任何一個大國或集團甚至連這樣的念頭都不敢有。

2) 使歐洲，至少歐洲大陸，得以成爲社會主義的歐洲，從而根除在世界這個地區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關於中國，該報告認爲要視中國對蘇聯的態度而定，邁斯基寫道：

既然是講到中國，那麼一旦日本戰敗，我們對中國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將可以得到實現。今後，蘇聯應當力求盡可能深入地使蘇聯的影響進入中國，並同中國盡可能加強友好關係，但是，蘇聯把中國變爲一個真正強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行動力度，基本上應當取決於中國內部發展的過程。如果這種發展的趨向有利於加強和鞏固中國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進步的和同蘇聯友好的人士地位，

²⁶ 邁斯基對“長時期”具體解釋說：“我的大約估算是：如果設想蘇聯需要花費十年左右的時間醫治戰爭帶給它的創傷，那麼在消除這次戰爭的條件下我們所應爭取的安全與和平的‘長時期’，應爲至少 30 至多 50 年。粗略地講，約為兩代人的日子”（〈邁斯基給莫洛托夫的關於《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1944 年 1 月 11 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16 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685 頁）。

那麼我們的援助自然將比相反的情況下更為強化。另一種情況也是可以設想的，即，我們無意（至少在一定的時期內）促進中國的強大，因為在一定的情況下中國可能對蘇聯形成某種嚴重危險。²⁷

這就是說，未來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取決於“蘇聯的影響進入中國”以及“中國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進步的和同蘇聯友好的人士地位”，質言之，蘇聯對中國可控或中國對蘇聯利益的讓渡程度，而非中國與蘇聯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邁基斯的這個報告中的相當部分與斯大林外交路線是一致的，或者說，斯大林採納了其中相當的觀點。在這種思路下，新中國成立後，斯大林對高崗的關注是必然的；高崗不應該的只是，他在組織之外主動呼應了斯大林這種關注。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斯大林為什麼又要出賣高崗。1967年7月25日，科瓦廖夫就此詢問米高揚，米高揚說他“怎麼也弄不明白，斯大林這樣做的動機究竟是什麼。斯大林為什麼出賣高崗”。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也說：“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這樣做是出於何種考慮。”²⁸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這並不是一個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應當瞭解1949年斯大林對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的新需求以及高崗在這種需求中的地位。

1949年中國實現統一，斯大林知道其在雅爾塔獲得的中國利益行將告終。在毛澤東即將訪問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對中蘇談判作了最壞的打算，他估計到蘇聯在雅爾塔獲得的中國旅順港基地可能保持不了多長時間。斯大林在1949年過江問題上對毛澤東“不信邪”的個性已有所領教，毛澤東能不聽他的話打過長江拿下整個中國，那收回

²⁷ 〈邁斯基給莫洛托夫的關於《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第699頁。

²⁸ 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379頁。

旅順港及中長鐵路，也就不在話下。與其如此，不如早作妥協，並利用這次妥協交換促成中國參戰支持朝鮮半島的統一。就這樣，作為應對與中國談判可能出現僵局的備案，斯大林將金日成實現朝鮮統一的要求納入考慮範圍。

早在 1949 年 3 月初，金日成與斯大林會面時，雙方談得最多的問題是朝鮮半島的軍事問題。²⁹ 儘管沒有見到直接記錄，但很有可能就在這幾次會談中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北朝鮮統一朝鮮半島的可能性，可能受到中國北方共產黨過江統一南方的形勢及美國即將從朝鮮半島撤出的情報鼓舞，³⁰ 斯大林這時也可能傾向於支持金日成的設想。斯大林這種傾向性隨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加快最終轉化為不可動搖的決心，這可從他 1949 年 3 月罷免莫洛托夫外長、任命什特科夫為駐朝軍事總顧問和金日成於 5 月派其負責軍事工作的金一³¹ 訪問北平的事件得到證明。

劉少奇訪蘇回國後，斯大林已將朝鮮的統一與其新的獲取出海良港的戰略聯繫起來。9 月 15 日什特科夫直接致電斯大林，分析了南北朝鮮的政治經濟形勢，並向斯大林提出傾向有限支持金日成軍事統

²⁹〈斯大林與朝鮮政府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49 年 3 月 5 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第 160 頁。

³⁰ 1949 年 2 月 23 日〈關於美軍撤離南朝鮮等問題致什特科夫電〉稱：“好像美軍正在撤出朝鮮，而且大部分已經撤出；駐朝美軍司令官在東京；在朝鮮只留一名準將，領導負責南朝鮮軍事訓練的軍官組，同時指揮當地撤軍。” 1949 年 4 月 17 日〈維辛斯基關於核實美軍撤出南朝鮮等問題致什特科夫電〉稱：“根據現有情報，預計美軍於 5 月撤出南朝鮮，移駐日本附近島嶼，以便給南朝鮮軍隊行動自由，與此同時，聯合國委員會也將離開朝鮮。4 月和 5 月，南朝鮮將把自己的兵力集結在三八線一帶。6 月，他們會突然襲擊北方，以便在 8 月以前消滅北方軍隊。4 月 10 日南方已在開城地區集結了約八千人（步兵旅），在議政府地區集結了一萬人（估計是第三步兵旅）。4 月 10 日還在東豆川里站臺卸下了三輛坦克”（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 154、170 頁）。

³¹ 金一（1910~1984 年），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重要領導人之一。

一朝鮮半島的“結論和建議”。³² 毛澤東訪蘇期間，中蘇雙方恰在遼東半島交換問題上談判陷入僵局。12月18日，毛澤東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說：蘇聯認為“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裡撤軍。³³ 毛澤東為此邀請科瓦廖夫談話，提出希望在第二輪會談中再次與斯大林就此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12月24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談，但斯大林在整個會談中大談與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亞洲兄弟黨的事情，而對毛澤東十分看重的中蘇條約問題卻隻字不提。毛澤東大光其火，決定不再露面，而在“別墅裡睡大覺”。³⁴

這樣雙方冷淡了一週左右，談判陷入僵局。而恰在這個時候，金日成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軍事統一朝鮮問題，什特科夫於1950年1月19日向蘇聯外交部電報彙報這一情況，³⁵ 這使斯大林在打破可能出現的中蘇在遼東半島的談判僵局上有了新思路。此時，斯大林下定決心，準備支持並幫助金日成完成朝鮮南北統一立場。因為朝鮮統一使他可借助金日成親蘇政權重新在朝鮮半島為蘇聯進入太平洋獲得更為優良的深水不凍港以取代旅順基地。比較而言，朝鮮半島比中國遼東半島更有利於蘇聯進入太平洋。³⁶ 此其一，其二，如果支持朝鮮

³²〈什特科夫關於南北朝鮮狀況及所應採取的對策致斯大林電〉（1949年9月15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251頁。

³³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100頁。

³⁴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第101頁。

³⁵〈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提出向南方發動進攻問題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1月19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305~306頁。

³⁶ 1897年3月20日，時任俄財政部辦公室主任、中東鐵路和華俄道勝銀行董事會董事P.M.羅曼諾夫向維特提交的備忘錄，提出將控制朝鮮作為優先的戰略選擇，他寫道：我認為，朝鮮對我們來說是至為重要的。北滿對我們的重要性，僅僅在於它為我們提供了通往遼東或朝鮮的捷徑。但是，在最近的將來中國人不會允許我們將我們的鐵路修到遼東半島的某個港口，因為他們瞭解，這樣做將把北京置於我們的掌握之中；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不會強烈反對我們的鐵路線從伯都訥經過吉林到達朝鮮一個港口，

統一，那就不得不請中國參戰，不管結果如何，斯大林——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中朝後來會在三八線停火——估計中國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軍事上依賴蘇聯並將不得已請求蘇聯長期駐軍旅順基地；如此一來，蘇聯在中國中長鐵路的權利也就順理成章地受到挽留。為此，早在1949年9月24日蘇聯政治局會議否定什特科夫的建議後，斯大林給什特科夫發出一封被註明“優先拍發”的電報，要求什特科夫“拜會朝鮮外務相或副相並告知，莫斯科同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應該建立外交關係的意見，至於建交時間問題，莫斯科認為越快越好”。³⁷很可能是在朝鮮問題上即將有求於毛澤東，斯大林終於讓步，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住處，表示同意毛澤東提出的“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方案。³⁸在這新的且有求於毛澤東中國的戰略思考中，斯大林必須獲取毛澤東的信任，斯大林明白毛澤東真正的顧慮在於蘇聯對中國東北主權的態度，而取得毛澤東信任的關鍵就是要向毛澤東證明蘇聯對中國東北沒有沙皇式的野心。為此，斯大林將科瓦廖夫轉給他的關於中共黨內情況的“秘件”親自交給毛澤東。這一舉動表面上看斯大林沒有出賣高崗，而是出賣了科瓦廖夫，實際上，出賣科瓦廖夫的這封信就是間接地“出賣”高崗這樣一位“能就中國領導班子內對蘇聯的真實態度提供寶貴情報的人”。³⁹而“出賣”

因為這會防止日本攫奪朝鮮。但是為了取得朝鮮的同意，我們首先必須具有影響朝鮮財政事務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們一定不要猶豫，即使是要作出財政犧牲，也不要猶豫（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101頁）。

³⁷ 〈斯大林關於中朝建交致什特科夫電〉（1949年10月3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261頁。

³⁸ 〈關於周恩來去蘇聯參加談判問題給中央的電報〉（1950年1月2、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11頁。

³⁹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380頁。

了後者，也就在中國東北問題上獲得毛澤東的信任。赫魯曉夫說：

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我們那位代表報回來的與高崗的談話記錄拿給毛看，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⁴⁰

斯大林“出賣”高崗這件事使赫魯曉夫想起了17世紀哥薩克首領馬澤帕：馬澤帕為了控制烏克蘭，同瑞典國王查爾斯密謀反對沙皇彼得一世，科楚別伊向彼得一世告發馬澤帕與瑞典勾結反對彼得一事，彼得為了把馬澤帕爭取到自己一邊，就把科楚別伊“告密”一事告訴了馬澤帕。結果馬澤帕處死了科楚別伊。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感慨道：“斯大林對高崗幹的事正是彼得對科楚別伊幹的，而毛對高崗幹的則是馬澤帕對科楚別伊幹的。”⁴¹

事實上，斯大林這一讓科瓦廖夫“怎麼也弄不明白”的舉動在相當程度上打消了毛澤東的顧慮。毛澤東自從收到斯大林交給他的那封科瓦廖夫“涉及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問題”的信後，心情好了許多，“食慾有所增加”。⁴² 這種信任為中蘇順利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乃至1950年底中國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決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高崗向斯大林提供的中共黨內矛盾的秘密材料，無疑得到斯大林好感。斯大林“出賣”高崗，並不表明斯大林放棄了對中國東北的“雅爾塔”企圖。只是斯大林對中國參戰的需要在當時實在迫切，而蘇聯在東北培養代理人只是長遠的考慮。長遠

⁴⁰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379頁。

⁴¹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379頁。

⁴² 汪東興著：《汪東興日記》第168、169頁。

敵不過眼前且必須服從於眼前的現實需要。斯大林可能作出這種估計，即朝鮮戰爭過後，中國將對蘇聯在東北的軍事存在更加依賴，屆時也就用不著代理人；如真需要的話，只要蘇聯在東北有軍事存在，屆時尋找和培養起來也不會太難。

四、“高崗問題”的處理與中蘇關係大局

事實上斯大林對中國從新疆到東北的整個關外地區的覬覦意圖，最終還是在 1950 年初中方被迫在斯大林要求下簽訂但沒有公佈的《補充協定》中得到體現。⁴³《補充協定》又使毛澤東本已形成了的對斯大林在中國東北問題上的信任遭到破壞。直到 1958 年 3 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才說：

1950 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訂立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要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裡，現在取消了。⁴⁴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

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搞了東北和新疆兩處勢力範圍、四個合營企業。

⁴³ 1950 年 2 月 10 日，斯大林讓莫洛托轉交中方一個排他性協定草案，其中規定在蘇聯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的領土上以及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境內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讓，並允許有第三國的資本或這些國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的工業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公司和團體的經濟活動。這些條件後被納入沒有公佈的《補充協定》之中（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第 108 頁）。

⁴⁴ R. 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284 頁。

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後的民族。你們說歐洲人看不起俄國人，我看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

爲什麼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幹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後，他又不信任我們。他大吹自己，說什麼中國的勝利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一定要徹底打破對他的迷信。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表。⁴⁵

毛澤東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戒心使得他在處理高崗問題也格外小心。有意思的是，與蔣介石為了不得罪斯大林，通過農林部長的虛位將主動要求加入蘇共的盛世才從新疆高調調回重慶⁴⁶的方法相似，

⁴⁵ 〈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6、388、393頁。

⁴⁶ 1938年9月盛世才訪問蘇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接見了他，會談期間，盛世才向斯大林提出加入蘇聯共產黨的要求。下面是出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323，第32~41頁，轉引自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第223~224頁）關於此事的記錄：

在會談結束時，莫洛托夫問督辦，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督辦回答說，如果他們有時間的話，那他有一個要親自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問題。他們回答說，爲了工作他們始終有時間。

這時督辦說：他的夙願是入黨（即加入聯共（布））。

他對自己要求入黨的願望作出的解釋是，他瞭解馬恩列斯的學說之後，知道這是惟一必須信奉的學說，況且他根據經驗確信，世界上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踐中援助弱小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黨的願望增強了。現在他得到了這樣幸運的機會，親自同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交談，因此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認爲可以接受他入黨，那他是很幸運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如果督辦非常堅持這個要求，那他不反對，但是伏羅希洛夫

1949年6月高崗回國後，其位置不降反昇，毛澤東用越來越多的虛職逐漸使高崗離開東北，這使毛澤東客觀上避免了1947年阿爾巴尼亞親蘇反南的納庫·斯皮魯自殺引起斯大林先對霍查後對鐵托極度不滿並最終對鐵托實施懲罰的後果。⁴⁷ 只是在斯大林臨近逝世的1952

同志說，這會損害督辦的工作，因為蔣介石和楊大使（中國駐蘇大使）知道後會很不滿意的。

督辦回答說，這需要保守秘密，無論蔣還是楊都不知道此事。

對此，斯大林同志提出異議說，這種事很難保住秘密，因為需要把他編到某一組織中，因此有一些人會知道這個情況。

伏羅希洛夫同志補充說，每個黨員可以不當這樣的黨員，或轉入其他黨，那時這個秘密就會被外人知道了。

斯大林同志提出一個問題：蔣介石不會以為督辦受到恐嚇被強迫入黨的嗎？

督辦對此提出異議說：蔣介石不知道此事，他再次堅持自己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同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同志商量後回答說，原則上他們不反對，如果督辦堅持這個要求，他們同意。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入黨後督辦也有新的權利和新的義務。

對此督辦回答說，他不怕有任何義務，他將願意履行所有義務。

莫洛托夫同志知道督辦攜家眷來訪後問，如果邀請他們全家赴宴，他意下如何？

督辦對這次邀請受寵若驚，並說，他的妻子將會感到很幸運，因為她不止一次表示希望見到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同志和蘇聯政府成員，但他督辦甚至禁止她提及此事，因為領袖不是她能見的。

就此斯大林同志說，不要這樣想我們，我們都是很普通的人，都是大家可以接近的人。

1940年代初，蔣介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盛世才感覺到中央政府不信任他，打算把他調出新疆，於是為了自保，逮捕了蘇共派來的一些工作人員，對共產黨人實行鎮壓，加強對在新疆的蘇聯人的人身控制，導致中蘇關係緊張。1942年盛世才被任命為新疆省主席，1943年加入國民黨，殺害陳潭秋、毛澤民等中共領導人，1944年國民黨軍進入新疆後，被調至重慶任農林部長。

⁴⁷ 納庫·斯皮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親蘇派領導人，宣傳和經濟部長。1947年11月，南斯拉夫共產黨認為不能再容忍阿共黨內的反南行為，鐵托發出了一封措詞激烈的信，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對斯皮魯的問題弄清事實，做出解釋。霍查懼於鐵托和南共的壓力，召開中央全會，討論鐵托來信和斯皮魯問題。斯皮魯感到失望而開槍自殺。關於斯皮魯的死，霍查向莫斯科解釋說，斯皮魯有反蘇情緒，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對此，蘇聯駐阿領事丘瓦欣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長篇報告，認為這種說法沒有證據。斯皮魯的自殺，引起斯大林對阿共霍查和南共鐵托極度不滿。

年底，毛澤東才用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位將其完全從東北——用高崗本人的話說就是“調虎離山”⁴⁸——調至北京。赫魯曉夫後來回憶說：“那時高崗還在政治局裡，但我們知道他實際上已經被打入冷宮。”⁴⁹ 1954年斯大林的影響已在中國基本消除後，2月份召開的中共第七屆四中全會上高崗也受到揭露和批判，高崗於8月17日自殺身亡。高崗之死令蘇聯人惋惜。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些蘇聯歷史學者還在其著作中將高崗與王明並稱為“蘇聯的忠實朋友”，⁵⁰ 稱：“蘇聯的忠實朋友高崗因反對民族主義傾向、堅持國際主義路線遭到毛澤東迫害致死”。⁵¹

1938年9月2日，新疆軍閥盛世才訪問莫斯科並受到斯大林接見時，在盛世才的積極請求下，斯大林同意接納這位軍閥為聯共（布）的秘密黨員。⁵² 無獨有偶，1949年6月27日，⁵³ 斯大林會見中共劉少奇一行代表團時，高崗對蘇聯不恰當的親近態度也引起斯大林的

⁴⁸ 1953年1月，高崗告訴饒漱石：“去年8月我就得到了通知，要我到中央來。但是我拖著，既不表態，也不成行。去年9月份，毛主席給我發了一封電報，請我早日來中央著手建立由我擔負的工作，讓我告訴他我何時可以到北京，並說習仲勛一兩天就到北京擔負中央宣傳部和文委的工作，我又拖了一個多月才到北京。”說到這裡，高崗“俯下身衝著饒漱石”說：“調虎離山！這你比我都懂。東北這個地方山很大，考慮大有迴旋餘地和藏身之處，一旦離開了，就不行了。我反反復復考慮究竟是不是調虎離山？是調虎離山又怎麼辦？”（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第135頁）。

⁴⁹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第380頁。

⁵⁰ 奧·鮑·鮑斯索夫著：《蘇中關係（1945~1980）》，轉引自《1977~1980蘇聯反華著作簡介和論點提要》，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1981年印行，第86頁。

⁵¹ 米·斯·卡皮查著：《中國：三個十年——三種政策》，轉引自《1977~1980蘇聯反華著作簡介和論點提要》第61頁。

⁵² 1938年9月2日斯大林會見盛世才並接收他加入聯共（布）。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參閱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323，第32~41頁），文件背景資料參見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第221~224頁。

⁵³ 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第729頁。

關注。但不知是否天意，從與羅斯福背著中國簽訂雅爾塔秘密協定後，斯大林在分裂中國問題上總不遂意，而斯大林支持中國出兵朝鮮戰爭的結果更是事與願違：中國在戰場上將美國人逼退至三八線以南的同時，也使蘇聯人知趣地退出了中國東北地區。1953年朝鮮停戰之後再看三年前中蘇簽訂條約中的那個《補充協定》，已如廢紙一堆。

那麼，現在看來“高崗事件”的定性始終被限制在“黨內路線”鬥爭範圍內，惟一的解釋是考慮到當時必須維護良好的中蘇關係大局：不便說外，只有說內；不便就事論事，只能借家事說外事。這導致後來許多“就事論事”的人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提法不理解、對高崗事件被定性為“反黨分裂活動”⁵⁴有看法，以致毛澤東在1955年3月21日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就黨內存在的“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⁵⁵、“知道高、饒一些壞事情，但是沒有看出他們的陰謀”⁵⁶等議論作長篇但解釋力不強的說明；直到1980年鄧小平在堅持對高崗事件處理的原有結論的同時，也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同志表示：“揭露高饒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⁵⁷

這樣看來，當時用“黨內鬥爭”由頭處理“高崗問題”，除了黨內鬥爭的因素外，它更多的還是毛澤東不便挑明的中國共產黨自1945年以來抵制斯大林利用雅爾塔秘密協定控制中國東北和新疆企

⁵⁴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09/mzzz/dsj/200909/01/t20090901_19915276.shtml）。

⁵⁵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7頁。

⁵⁶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01頁。

⁵⁷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3~294頁。

圖的鬥爭的繼續。⁵⁸ 事隔半個世紀後，楊尚昆同志才在 2001 年發表的〈回憶高饒事件〉⁵⁹ 一文中算是將話挑明了。他說：

對高、饒事件，還需要說到，這事後面確有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背景：他們企圖置中國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東北和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爲此，需要在中國黨內高級幹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隨者和代理人。高崗在東北總攬黨政軍大權，那時他同蘇共和蘇聯政府的關係極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對此早有察覺和警惕。1953 年高崗敢於那麼放手搞分裂黨的活動，有國際後臺支持，也是掩蓋不了的事實。

當時在高崗問題的處理上，毛澤東確有上述難言之隱，以致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表。”⁶⁰ 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鮮戰爭結束，西方對新中國的封鎖和打壓將更加嚴酷，在這樣的時候，尤其是在赫魯曉夫剛剛上臺不久，保持良好的中蘇關係對新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將“高崗事件”的處理限制在“黨內路線鬥爭”範圍內，有利於新上任的赫魯曉夫進一步發展對華關係，擴大對新中國的援助項目。從赫魯曉夫上臺不久蘇聯對華援助大幅增加的事實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當時毛澤東同志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繫一起的深層考慮，理解這些考慮，我們也就理解了當時毛澤東採取處理高崗的方式，以及鄧小平仍然堅持當時處理高崗問題的結論的深層原因。我們從 20 世紀 70 年代中蘇關係惡化的年代，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蘇聯政要及戰略

⁵⁸ 張文木：〈論“雅爾塔秘密協定”框架下的中國反分裂鬥爭及其世界意義〉，《領導者》2009 年第 10、11 期。

⁵⁹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 年第 1、2 期。

⁶⁰ 〈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 7 卷，第 393 頁。

學界對斯大林“出賣”高崗之事的後悔和不滿，也反面證明，毛澤東處理高崗的方式——如果我們比較1947年阿爾巴尼亞親蘇反南的納庫·斯皮魯自殺招致斯大林先對霍查後對鐵托極度不滿並最終對鐵托實施懲罰的後果及其對他們國家利益損害的後果——是合適的和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

五、“高崗問題”之後應當注意的問題

以上只是筆者在閱讀史料時僅就1949年6月高崗隨團赴蘇之後所表現出的“高崗問題”所作的一點考證和思考，但這些並不意味著否認此前高崗曾為中國革命做出的傑出貢獻，相反，筆者以為，我們還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對高崗錯誤批評的前提下，我們也應對高崗曾為中國革命所做出的貢獻予以應有的肯定並表示應有的敬意。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⁶¹ 批判舊世界不易，而建設新世界更難。如果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因過廢功——這與因功廢過的結果一樣，或因一時之過廢一生之功，那就脫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這就會使我們處理人事的結論經不住歷史的考驗並在相當長的時期裡留下“後遺症”。而如何避免這些“問題”之後的問題，大概更是我們在對歷史人物研究中尤其要注意的方面。

⁶¹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頁。